

俄国



巴赫金集

20世纪

外国文化名人

书库

上海远东出版社

巴赫金集

张 杰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欣

封面设计 赵小卫

本书中文版由俄罗斯巴恰洛夫先生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
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巴赫金集

ER SHI SHI JI

WAI GUO WEN HUA MING REN SHU KU

张杰 编选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编200233)

印张 12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千字 31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插页 4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第1次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472-7 / C·25 图字:09-1998-016 定价:16.00元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战兢兢。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国外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主编开卷语

林贤治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 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继而又红了欧亚一大片,甚至点染了美洲一角。30 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险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战后的冷战季节不算太长。及至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那些历史的过客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使东方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保持独特的面貌。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的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至60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至70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至90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时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20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编者序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巴赫金(1895—1975)是20世纪苏联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之一,是苏联文艺理论家中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他在哲学、美学、文艺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提出并独特地解析了一系列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巴赫金学术研究的广度、创造性思维的深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他在理论研究上的成就已经得到世界上普遍的承认。这位自称是“哲学人类学家”的巴赫金,由于论题广泛,著述浩博,在现代西方学界越来越被视为与众多学派和理论相关的重要人物。他时而是一位社会学家,时而又是一位历史文化学家,时而受到语言符号学家们的推崇,时而又令结构主义者和叙事学家们倾倒。他的学术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声部”现象,甚至有时人们会怀疑这么多复杂的思想是否皆出自同一个人的头脑。巴赫金研究目前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巴赫金学”。到1995年止,国际巴赫金研究年会已举行了七届。

本文集选收了巴赫金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论著中的一些主要篇章以及部分书信。虽然巴赫金所涉及的学术领域非常广阔,但是他更主要地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如果对他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作大致规定的話,那么他可以被划入俄、苏文学批评中的历史诗学流派。这一流派兴起于19世纪末,由俄国著名文艺批评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历史诗学批评的任务是,要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中,探讨文学体裁

和形式的变化。巴赫金几乎一生都在致力于诗学问题的探索，其研究的最主要问题是“小说创作中的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集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巴赫金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主要观点。这种研究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复调小说理论”。

巴赫金对“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建立在探讨一般文学创作中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的基础之上的。他和大多数历史诗学的批评家们一样，从历史变化的角度，考察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历史渊源，探索古代人类文化对现代小说构造的影响。本文集第二部分的两篇长文主要论及的是该方面的内容，其重要成果为“狂欢化理论”。

应该说，巴赫金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产生世界影响，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一两种新的小说理论或提出了某种关于文化现象的理论，更主要的是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使得巴赫金在探讨文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许多其他问题时，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本文集第三部分的四篇文章主要就小说研究方法、形式主义诗论以及语言符号学和心理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里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弗洛伊德主义》中选出的三个篇章，虽然巴赫金的好友沃洛希诺夫和梅德维杰夫也参加了写作，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巴赫金为主的。

巴赫金的学术道路是艰难而又坎坷的。他生前的寥落与死后的声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苏联，巴赫金的学术成果被“发掘”还是60年代初的事情。本文集最后一部分所收的“致科日诺夫的信”，真实地记载了这一过程。而“巴赫金年表”则描绘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一生活动的轨迹。

一、生平与学术活动

巴赫金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应该说，是从人本主义开始起步的。准确地说，他是作为一个现象学家或存在主义者步入文学论坛的。因此，西方学术界习惯于把巴赫金在1924年以前的活

动时期称为“现象学时期”。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并不太长。

巴赫金于1895年11月17日出生在奥廖尔城。他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但先祖却是古老的,在14世纪就已起家的贵族。巴赫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维尔纽斯度过的,后来全家迁居敖德萨。1913年他在那里中学毕业,进入诺沃罗西斯克大学(现在的敖德萨大学),不久(1916—1918)又转入彼得格勒大学,并在该校的历史哲学系毕业。在大学时期,他先后学习和掌握了古代俄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和英语等,对意大利语、丹麦语也有了解,并且勤奋地钻研了文艺学、语言学和哲学。

大学毕业后,巴赫金来到威帖布斯克省涅维尔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任文学教师。在白俄罗斯边界这座小城的两年生活(1918—1920)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环。因为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有了组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后来结为终身好友。他们组成了“康德研究小组”,主要成员除了巴赫金之外,还有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蓬皮扬斯基(1891—1940)、青年哲学家和新康德主义者马特维·伊萨耶维奇·卡甘(1886—1937)、诗人和理论家瓦连京·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1893—1936)、诗人和雕塑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祖巴金(1894—1937)以及女钢琴家玛丽亚·韦尼阿米诺芙娜·尤金娜(1891—1970)等。小组的成员们是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当时卡甘负责美学方面的研究,祖巴金负责自我教育和艺术伦理,巴赫金主持艺术讲座,后来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文艺班”。小组的活动十分活跃,到小组成立一周年时,也就是1919年9月13日,出版了“一日文集”——《艺术节》,上面刊登了巴赫金的第一篇论文《艺术与责任》,这是他在“康德研究小组”里的一次发言。

1920年秋,巴赫金转到省城担任威帖布斯克师范学院文学教师。这年年底,他又兼任了威帖布斯克音乐学院音乐史和音乐美学教师。十月革命以后由于莫斯科、彼得格勒的物质困难,许多学者云集威帖布斯克,使这座省城成了当时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科学与文化中心。巴赫金的学术交往圈进一步扩大了,在

他周围很快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组。除了原“康德研究小组”的成员沃洛希诺夫、蓬皮扬斯基以外,还有一些新人:音乐学家和戏剧史家伊凡·伊凡诺维奇·索列尔京斯基(1902—1944)、文学理论家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梅德维杰夫(1892—1938)等。

巴赫金于1921年7月10日在威帖布斯克同叶连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奥库洛维奇(1901—1971)结婚。五十年间,她不仅是一个与丈夫相亲相爱的妻子,而且在丈夫竭尽全力生活和学术活动中,无论多么艰难坎坷,一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在威帖布斯克的这个年轻的思想家们的小组只延续了短暂时光,大多数成员先后去了彼得格勒。到1922年底,只剩下巴赫金一人,那时他在少年时代就患上的全身性骨髓炎恶化,1923年终于因病致残(1938年他由于该病而被截去一条腿)。

最能反映巴赫金这一时期思想特征的,是他在20年代写下的《走向行动哲学》等手稿。这些手稿表明,他早期的哲学观是一种存在主义或现象学意义上的宏泛介入性人生观。

1924年底,巴赫金回到列宁格勒,在国家出版社找到一份编外的工作,并在著名的艺术史研究所谋得一份工作,这个研究所当时已成为形式主义学者们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在这里,巴赫金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在西方评论家的眼中,这一时期可以称作社会学和语言学研究时期。西方评论界又以列宁格勒时期(1924—1929)和流放时期(1929—1936)将它分为两个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巴赫金由批判新康德主义和纯科学化理论,转向了对形式主义的批判。

巴赫金在列宁格勒积极参加了学术沙龙的活动。他与沃洛希诺夫合写了《弗洛伊德主义》(1927年)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年),与梅德维杰夫合写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年)。巴赫金及其合作者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探索。他们不仅反对主观的心理学和语言学,而且还彻底批驳了经验主义的理论,并竭力把“社会性”引入“语言学”的范畴,企图建立独特的“超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形式主义诗学把语言归结为法则、程式,根本忽视了话语的意义:话

语主要是两个人——两个本身受到社会制约的人——之间的桥梁。巴赫金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在1929年以他自己的名字出版的第一部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最后部分和长篇论文《小说中的话语》中,着重研究了语言的作用。巴赫金仔细探讨了叙事作品中的各种声音与陈述行为明确的主体声音交融的方式。

1928年底,由于巴赫金及其好友的学术团体活动被视为非法,他们先后遭逮捕。巴赫金于1929年夏被判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服刑五年。由于巴赫金患有重病,在他的妻子和朋友们的多方活动下,根据医生委员会的意见,该判决被改为流放库斯塔奈。库斯塔奈是西伯利亚与哈萨克交界处的一座小城镇,那里虽无搞学问的条件,但因气候干燥炎热,对于患有肾脏病和骨髓炎的人来说,倒是很有益的。

流放结束后,巴赫金于1936年9月底来到萨兰斯克的莫尔多瓦师范学院任一般文学和中学文学教学法教研室讲师。从这时起,他开始撰写学位论文《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和一部论述歌德的专著(此书遗失,只留下一些片断)。一般认为,巴赫金学术活动的第三个时期,即历史文学时期正是由此开始的。

1940年,巴赫金完成了学位论文。手稿分别送交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的西欧文学研究所。不久,他又向世界文学研究所递交了两份手稿:《小说理论》和《梅尼普讽刺的历史》。在这些手稿中,巴赫金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广泛地探讨了小说理论的问题。

1941年夏,巴赫金迁居基姆列城(在莫斯科郊区),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以后又在几所城镇中学教学,讲授文学、俄语和德语。在二次大战期间,巴赫金一家一直住在基姆列。

1945年秋,莫尔多瓦师范学院(自1957年起改为莫尔多瓦大学)再次邀请巴赫金到萨兰斯克工作。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通文学教研室主任。1946年10月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了巴赫金的论文答辩会。巴赫金的论文以其广阔的科学视野、独特的

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学术思想令评委们大为惊叹。三位评委一致建议学术委员会立即授予巴赫金哲学博士学位。然而经过反复讨论,他最终只被授予了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这一结果对于一位后来名扬四海的大学者来说,不免荒唐。但巴赫金并不计较,他仍旧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绝意功名,潜心工作,也许正是他日后成为世界性大学者,并且虽然身患重病仍能活到80岁高龄的原因所在。

1957年巴赫金主持了莫尔多瓦大学俄罗斯和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工作。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果有:《言语体裁问题》(1952—1953)、《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本文问题》(1959—1961)、《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1965)。

1969年秋,巴赫金前往莫斯科治病。1971年年底他的妻子去世。1975年3月7日巴赫金与世长辞。

二、复调小说理论

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①巴赫金指出的是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他借用了音乐学中的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

巴赫金还进一步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这种复

①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第29页。